



名邦硕儒张穆

董怀庆 著



总主编 张鸿仁
阳泉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目 录

书香门第	1
应试受阻	6
心仪顾公	11
关心国事	16
良朋诤友	21
两游江南	24
校刊订正	26
舆地建树	31
能诗善书	40
英年早逝	44

名邦硕儒张穆

书香门第

清嘉庆十年(1805)农历十月初九,一个男婴在山西省平定州大阳泉村(今属阳泉市)的一户张姓人家呱呱坠地了。因为他的前面已有了三位兄长——开暹、进暹、丽暹,家人便给他起名为羸暹。他排行第四,乳名便叫四楷,他就是后来的张穆。古人有名有字,有号,张穆字石舟,号靖阳亭长。

有清一代,平定州被誉为“文献名邦”。而张家又是这名邦中一户典型的书香人家。

张穆的祖父张佩芳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进士,历任县官、州官;所到之处,政声清明,深得当地人民的拥戴。

张佩芳不仅是个清官,还是位学者。从政之余,喜好著书立说,其主要著作有《陆宣公翰苑集注》《公余杂谈》《黄山志》《平定州志考误》《希音堂文集》等。

张佩芳钟情“朴学”,擅长考据,通晓天文地理,熟悉历代沿革,他的著述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

张穆的父亲叫张敦颐,乾隆三十七年(1773),生于合肥县署,因为当时他的父亲张佩芳正在那里做官。张敦颐幼时,“颖悟绝人”,14岁时,应童子试(县一级的考试),能熟练地背诵《十三经》。嘉庆五年(1800),学使莫进来山西选拔“茂才异等”,让敦颐入晋阳书院读书,半年的7次考试中,回回第一。莫老先生深为叹服,认为:“三晋多才,对此皆当俯首。”

同年秋,敦颐乡试(省一级考试,考中者为举人)报捷。莫先生携之入都,等待参加会试(国家一级的考试,考中者为贡士)。1802年,敦颐会试落榜。9年之后,终于会试高中,并以贡士的身份参加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中了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武英殿编修和福建正考官等职。这些职务,大多和文化教育有关。

敦颐生性和善,乐善好施。遇有贫困危难之人,必倾囊相助。一次,在从京城返乡的路上,见清水河畔,有一具暴露在野外无人掩埋的尸体,他便当掉自己的衣物,买来棺木,将死者掩埋。

张敦颐曾应平阳府太平县令顾玉书的聘请,主讲于太平书院。他循循善诱,要求严格。及至科考,一个小小的县级书院,获俊者竟有6人之多。他对张穆的教育更是周到,既有父亲的慈爱又有师长的严格,可谓“父而兼师”。

张穆从小受到了父亲严格的教育,也受到了周围兄长们的熏陶习染。他常常和二兄晋暹、三兄丽暹挑灯临书,学习诸书法大家之长,融会贯通,终于成为一代书法

名家。

1814年的秋天,年仅9岁的张穆,随同父亲来到北京。

北京,不仅仅是清帝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名流学者云集于此。

张穆经常随同他的父亲拜谒这些学界的长者,瞻仰了这些鸿儒大师们的风采,聆听了他们的教诲,扩大了视野,增进了学识。

到京后第二年,张穆的母亲王氏病逝。当时的他,年仅10岁。幼年丧母,对张穆来说,无疑是个巨大不幸。

值得庆幸的是,张穆遇到了一位能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般对待的既慈爱而严格的继母。

继母姓李,她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因为张穆的父亲张敦颐在晋阳书院读书时的成绩优异从而对他刮目相看的皇家学使莫进的表妹,由莫学使主媒,嫁给了刚刚丧妻的张穆的父亲。

可惜,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年,张敦颐突然撒手人寰。这位新婚一年的新娘顿时成了寡妇,而张穆也失去了父亲。

听到丈夫去世的噩耗,这位性格刚烈的女性本欲以死相殉,但看到身边的年幼的张穆,却又改变了主意,她含着眼泪,抚摸着张穆说:“你的父亲不幸离去,把你托付给我,如果我随着他命归九泉,谁能把你抚养大呢?我就等着你长大成人吧!”

张穆和他的继母当时寄居在京城莫进的家里。张穆

在外就傅读书，他的母亲便等候在家里。每天晚上学毕归来之时，这位继母必定坐在榻上检查张穆的功课，听他朗诵当日所学的诗文，直至夜深人静。

看到张穆学业有长进，她便喜形于色；否则便惆怅累日，一边哭泣，一边对年幼的张穆说：“你的父亲生前希望你长大成材，如果荒废了学业，耽误了前程，我死后还有何面目在九泉之下和你的父亲相见！”

此情此景让张穆后来回忆起来“至今每念之，尤觉此言之痛也！”

那莫老先生也没有把张穆看成外人。他谆谆教导，循循善诱，让张穆觉得，莫老对他的关心甚至超过他同姓的子弟。

谁料这位不是亲母胜似亲母的继母李氏，终因教育子女心劳力瘁，年仅 24 岁发病辞世。而这一年，张穆刚刚 19 岁。

家庭连遭不幸，对寻常人来讲，恐怕早已在噩运面前却步不前，但张穆却像一株疾风中的劲草，越发刻苦勤奋了。

在回乡守丧期间，他就地问道，常常拿着自己的文章请同村的举人李日茂“开判疑滞，刮磨润色”从中获取教益。

他又在家里重新点定由唐代名臣陆贽所撰，其祖父点评过的《陆宣公翰苑集注》。当时，著名学者刘大魁曾赞叹张佩芳的点评“穷极幽远”，认为阅读他的点注“恍然如置身于有唐之世，亲见陆公与之上上下下议论”。能够对

这样一本文集重新点定，可见当时张穆的学识功力已非同一般。

张穆还曾和他的兄长及学友读书于蒲苔山、天门山及柏木山庄。

蒲苔山在狮脑山南麓，其上有巨石如帽，石帽凹处积水，有菖蒲生其上，以故得名。大石之旁有参天古松数株。这一胜景，笔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曾亲自观览过。

山中有寺，因其距大阳泉村不远，往来方便，张穆和他的二兄晋暹在 1825 年至 1826 年间，曾在此读书。张穆曾在一首《题烟雨归耕图》的诗中回忆当时的苦读情形：“曾共阿兄栖翠微，古松帽石相依依。书声夜起斋鱼静，山寺春深野雉稀。”

1826 年，张穆守丧期满，到县城的“郡庠”（即州学）读书。

古代的科举考试分为童子试、乡试、会试、殿试几个级别。童子试是县一级的考试，考中者俗称秀才。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考中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是国家级的考试，考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参加殿试的是贡士，考中者统称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在每届乡试之前，各省学政要巡视各州府，考试欲参加乡试的生员，称之为科试，意在选拔优秀人才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

据《补庵公行述》中记载：“戊子科试，羸暹忝列第一”，那个“忝”字是个谦词，有备员充数之意。去掉那个字，可见张穆这次科考中确实名列第一。

但这个第一并非乡试的“第一”，乡试第一名当为解元。有些人认为张穆曾经获得过举人考试的第一名，这是因为不了解“科试”与“乡试”的区别而产生的误解。

应试受阻

道光十一年(1831)的秋天，张穆从家乡来到省城太原参加到京城国子监(国立最高学府)读书的选拔考试。参加这种考试的考生是由州府教官上报，再经学政与总督与巡抚商定认可，又经学政主持考定，然后选择“文行俱优者”保送入京就读，叫做优贡生。

经过考试，张穆取得了优贡生的资格。按照当时的规定：优贡生进入国子监学习，朝考期满之后，可以做官，不过起点很低，一般只能从教官做起；如果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殿试即由举人而贡士，由贡士而进士，可以取得更为广阔的进升之路。

现在，摆在张穆面前的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以他的学识才华，乡试中榜，考取个举人，进而入京参加会试、殿试，考取个进士什么的并非难事。但张穆选择了“以优贡生入京”的起点很低的做官之路。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他的内心深处，到京城见见世面，在国子监接受几年熏陶，广交天下文友，博览文化

典籍,从而成就一番事业的意识,胜过了做官为宦,光耀门庭的愿望。

在这一年,还有一件事需要提及,早春二月,他曾前往寿阳平舒村拜访祁寯藻。

此公何许人也?

祁寯藻,字叔颖,号淳甫。乾隆年间史地学家祁韵士的第五子。嘉庆十九年进士,官任侍郎、尚书,后为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执掌国家重权。《清史稿》称其为“三朝耆老,辅导冲主,一时清望所归焉”。

中英鸦片战争期间,主张查禁烟贩。曾为抗英名将郑延廷雪诬。

他又是个饱学之士,著有《马首农书》《幔瓠亭集》。

因为母亲在籍卧病,祁公回家省亲。此时正家居在乡,这给张穆与他的会见提供了契机。

祁寯藻和张穆还有姻亲关系,他的小妹就是张穆的三兄丽暹的妻子,因此,张穆呼祁寯藻为五兄。

因此,张穆的这次造访,既是亲戚往来,又是切磋学问。可以说与祁寯藻的交往,对张穆的人生走向及其学术研究都有重大影响。

张穆在1832年农历的正月入京,国子监朝考期满。按当时的规定,朝考一等者任知县,二等任教职,三等任训导。张穆考试成绩居中,选任正白旗官学教学,当了一名教员。

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张穆在北京,准备参加顺

天府乡试。

乡试在清代科举考试中是道难关，因为中式名额十分有限。嘉庆年间的山西，每届乡试仅可取士 80 人左右。张穆曾由京返乡，参加过两届乡试，均未考中，只好留在北京教书。不过因是优贡生的身份，便多了一重选择，可以到顺天府应试。一者顺天府中式名额之多为全国各省之首，二者张穆也希望转换考试场地能给他带来好运。

考试设在北京顺天府贡院，时称“北闱”与南京的“南闱”并称当时中国的两大考场。

其大门正中有贡院匾，内建仪门、龙门，再进去有望楼，人称明远楼，专供巡检人员眺望之用。考生的试房，按《千字文》的顺序排列，约共九千余间。人居一间，大约一米见方。考生入号后即将栅门关闭，等交卷时方可离开。上厕所要领号牌，有专人跟随，出去者曰“出恭”，回来者曰“入敬”。直到现在，我们阳泉乡下的一些老人们还把上厕所称作“出恭”。

考场的场规非常严格，衣食文具皆有特殊的规定。比如参考人员考蓝中所携带的食物、糕饼馒头都需要切开检验，“片纸只字不准携带入场”。

8月8日是这次乡试的头场。重八是个好日子，但给张穆带来的却是一场厄运。

原来，张穆在入场之时，考蓝中带着一瓶酒。提检小吏发现后呵斥：“去掉酒瓶！”张穆听后却拿起来一饮而尽，然后才扔掉酒瓶。这个举动惹恼了那个平常惯于作

威作福的小吏。于是小吏和他的同伙开始翻检张穆的考蓝，在翻检过程中毁掉了他的笔、墨、砚台，撕破了他的衣服。这下可激怒了张穆，他拍打着自己的肚子说：“这里是我藏经的书箱，五经四书都在里面，你们能搜检出来吗？”

搜检人员更为恼火，继续进行更为严格的检查，果然从他的笔袋中发现一张有字的纸条，不过与考试无关，是他平时写作时残留的废纸。谁知那搜检人员竟然以此为证，一口咬定张穆有意“挟带”，当即送交刑部处理。

刑部判定：革去优贡生资格，永远不准参加考试。

张穆的入仕之路彻底断绝。

对于这次导致张穆人生转折的巨大事件，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张穆因小失大，过于鲁莽；有的人认为他使性仕气，有失检点；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作怪。

对于这些见解，笔者皆不敢苟同。

让我们看一看张穆在这件事发生前后的一些表现。

前文讲过，张穆放着由乡试而会试而殿试，由举人而进士而状元的坦途不走，而选择了以优贡生的身份去北京当一名“教事”的小径，说明他的内心深处有着长见识，做学问胜过光耀门庭的意识，此其一。

到北京后，他所从事的重考据，重实践，以经国济世为目的的“朴学”研究，也与那考场专用的华而不实、僵化死板的“八股”时文毫不相干，此其二。

事发前，张穆对这次考试作了“精心”准备。考前心态平静，“胸有成竹”，备考之余，照样和友人们品诗论画，饮茗喝茶，此其三。

事发后，“气甚平”“语甚逊”“虑甚周”不像是做了什么“鲁莽事”之后的后悔莫及的心态，而且，其后并没有像他的好友沈垚那样，从此一蹶不振，郁郁而终，此其四。

他平生最为仰慕的人物是顾炎武。人们知道，亭林先生是明朝遗民。清廷慑于他的品德学问，使用了种种手段，想为其所用，皇帝屡屡下诏，召“博学宏辞”。但他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固辞不就”。张穆也是个“不合作者”，此其五。

由此我们想到了不买唐明皇的账，在大庭广众面前敢于戏弄权贵的李太白。

由此我们想到了敢于和封建礼教孤军奋战的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

看来，张穆的这次偶然事件，只是偶然中的必然罢了。

至于张穆的幸与不幸，历史早已作出了结论。如果张穆考试得中，中国历史上只不过多了一个为五斗米折腰的小吏，哪里还会有那些彪炳史册的皇皇巨著！

有清一代，即以平定而论，进士及第者数以十计，然能够在其学术领域占一席之地者，仅石舟先生一人而已！

这一年的张穆三十五岁。

从此以后，他长期寓居于北京宣武门外的上斜街闭门著书。书斋定名为“月斋”，名字也由张羸暹更名为张穆。

在这里，我们不妨咬文嚼字地来一点考证，斋名“月”，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月，归也，从反身。”徐锴注曰：“古人之所谓反身修道。”

如果说，在顺天应试之前，张穆还没有认清这个没落王朝的黑暗而“锐身进取”；那么，在经历了这场看似意外其实也在意料之中的事件之后，张穆采取了决绝的态度，迷途知返，去“反身求道”。至于张穆的那个“道”，到底是什么？从他后来的言行中不难看出。

那个穆字，有肃穆、静穆之义，兹不赘说。

从此之后，他便在自己的月斋里开创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

还有一件事需要提及。时任编修官，詹事府赞善，进士出身的赵振作，毅然将自己的胞妹嫁给了这个终生已定的连个举人名分也捞不到的白丁张穆。

可见，慧眼识珠之人还是有的。

心仪顾公

在张穆所景仰的先贤之中，顾炎武名列其首。

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少时入复社与晚明阉党斗争。清兵入关后，在昆山兴义师抗清。事败后游历北国，考察地理形势，写成《天下郡国利病书》，

为反清复明做准备。康熙皇帝曾屡诏入博学宏辞科荐修明史，皆坚辞不就。他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晚年移居北方，年七十而卒于山西曲沃。

在学术方面，《清史稿》称其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研究学问，他主张“敛华就实”；于百科，“穷究原委”“考证得实”，讲求实事求是。除以上提到的著作之外，还有《日知录》三十卷，历时30年而成，是他平生心血的结晶。另有《肇域志》一编及其他史地著作多种。

此外，他又是文字学家，著有音韵学著作多种。

张穆对顾炎武的关注，可以追溯到道光十八年（1838）的春天。顾炎武的老友颜光敏在北京家中收藏着许多顾炎武的诗文手稿，这些手稿后来归陶梁所有。张穆在南游之前，特意到陶梁家抄录。后来在南游期间，每到一地，总要留心有关顾炎武的材料。这是张穆为顾炎武编写年谱的最初准备阶段。

道光二十二年，徐松赴任出京时，曾将自己早年所写的《顾炎武诗文系年》的草稿交给张穆。又过了一年，何绍基为父守丧期满回京，他搜集到了顾炎武嗣子顾衍生等人编写的《年谱》并把它交给张穆。张穆将这两部草稿进行综合，加以厘定，于道光二十三年春写成《顾亭林先生年谱》。

张穆在《顾亭林先生年谱》的题词中，是这样评价年谱主人公的：“本朝学业之盛，亭林先生实牖启之。而洞古今，明治要，学识赅贯，卒亦无能及先生之大者。”他认为：“有清一代，学术研究风气之盛，实在是由顾炎武开

启的。而他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能够洞察古今的变化,阐明治理天下的要领,其学问和见识的深刻一贯,直到今天也没有谁能够赶得上他。”足见张穆对这位先贤敬佩的程度。

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了《表》那种以系年的方式概述一个国家、一段历史的简明扼要的叙史手法。而被称为“一人之史”的年谱在宋朝才开始出现,后继踵于明,至清而极盛。

近代大学者梁启超认为,张穆所撰写的《顾亭林先生年谱》“于谱主所旅之地位,所接之人等,考核精密,细大不遗”是清代年谱中的精品。

在撰写《顾亭林先生年谱》的同时,张穆还与友人集资兴建了顾亭林祠,此祠又称顾炎武祠或顾祠,地址在北京宣武门外慈仁寺西院。每年春秋两季及顾炎武的生日都要举行祭祀活动,而张穆则是逢祭必到。

道光二十四年,顾祠落成,首次公祭。

地处北京宣武门外慈仁寺西院一隅的顾炎武的祠堂挤满了前来祭奠的人。仅当时在场的硕儒名流就有十四人之多,当然其中不少是张穆志同道合的好友,如何绍基、苗夔等人,但也有几位当朝的重臣前来应景。比如那位后来文韬武略、声名显赫的曾文正公——曾国藩也在其列。

祭文由张穆亲自撰写,亲自宣读。文章很短,不足千字,不过其中有些话语颇值得玩味。

开头一句统领全篇,道是:“先生生当季叔,业贯汉

唐,学堪为王者师,志非以名山老。”

季叔二字是古代兄弟排行的最末,二字略指顾炎武生在明朝末年。照理说,张穆是清朝的臣民,此处宜用“亡明”或“伪朝”二字,张穆在此处隐而不用而以季叔代之,其中大有深义在焉。

第二句中的那个“业”字,是仅指顾炎武的学术研究成果,还是指他的生平业绩?如果仅指前者则祭文有失偏颇,如果是指他的生平业绩,那么顾炎武毕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就是他的学术研究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就说他的力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吧,那是顾炎武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考察天下郡国的利弊,一旦天下有变,就可以立刻用于军事目的的。

第三句“学堪为王者师”说得更直露。那“王者”可不是占山为王的草寇,而是君临天下的帝王,作者是在说,凭顾炎武的学识才华,足可以给那些自命不凡的天子们当老师。

第四句“志非以名山老”是顾炎武一生的概括。清军入主后,那些曾经高举义旗起兵抗清的人们,有的隐退了,栖居名山,以隐士自居;有的消沉了,回归田园,以耕读自乐。而这个顾炎武,不为高官厚禄所引诱,不怕杀头坐牢的威胁,不改初衷,天下奔走。就是他的晚年,也不去山明水秀的故乡——江南去终老,而是埋骨于风沙黄土中的山西曲沃,其中用意不言自明。

张穆到底要在这篇祭文中传达什么信息?笔者不好妄加猜测。在此,只是提供一些资料,结合顾炎武的生平

行事作一点分析,在文字上作一些诠注,以待高明。

时过不久,这一年三月,张穆的好友许翰来京。因为错过了顾炎武的春祭,张穆和在京的友人为他特设一祭。

在顾公祠中,有四人配祠:俞正燮、沈圭、张潮,张继亮。前三人生前都是张穆的好友,而且也都是西北舆地的精英,张穆以他们配祭顾炎武也在情理之中。

唯独那个张继亮,生前与张穆并没有密切往来;在学术方面,也没有什么鸿篇巨制。何以能在顾炎武的祠堂中占有一席之地?

原来,张继亮生前与龚自珍、魏源这些在清末具有民主思想的人物过从甚密。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上奏朝廷的禁烟折子,“张继亮有功与焉”。后来主战派姚莹因奋力抗英获罪,张继亮又在京中到处奔走,为他申雪,但不幸病死于松筠庵。一时间,张继亮成为敢于对抗黑暗,伸张正义,以身殉志的典范。张穆的用心一目了然。

除《顾亭林先生年谱》之外,张穆还撰写了《潜丘年谱》。

那潜丘先生姓阎,名若璩,字百诗,潜丘是他的号,山西太原人,世业盐筴,侨居江苏淮安。在明末清初的学者当中,人们把他和顾炎武并举,赞誉“亭林之大,潜丘之精”。认为“顾炎武学识博大,阎若璩见解精深”,可以说都讲到了两人的要害之处。

阎若璩的最大贡献在于对《尚书》的辨伪。那《尚书》